

# 乌蒙山区贫困“锅底”如何筑起教育“高地”

##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镇雄中学“教改”启示

本报记者林碧峰

乌蒙山深处,18岁的程雨滴家境贫寒。对她来说,刻苦学习是走出大山的唯一出路。

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牛场镇高桥村,是程雨滴的家乡。几年前,作为脱贫户家庭一员的她,从牛场镇高桥九年一贯制学校考入云南师范大学附属镇雄中学。

高二那年,她父亲因肝硬化去世,母亲离家出走,生活遭遇突变。让她感到幸运的是,“无论我考什么成绩,老师始终支持着我。”

去年,程雨滴以666分的成绩,考取南开大学临床医学专业。她说,一路走来,是学校给了她依靠,让她始终坚信贫困学子也能发光发热。

地处乌蒙山腹地的镇雄,曾经是我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最多的县,去年11月正式脱贫摘帽。

为“斩断”贫困代际传递,镇雄在教育扶贫上狠下“绣花功夫”,与云南师范大学合作创办云南师范大学附属镇雄中学,是关键一招。

近些年,学校通过探索“驾驭式自主教育”改革,实施“三备三研”集体备课制度、开展课堂自主合作、创新思政教育等举措,大幅提升教育质量。这里曾经是贫困“锅底”,如今筑起了教育“高地”。

### “三备三研”提升教学质量

让自家孩子像程雨滴一样,考上重点大学,是镇雄县乌峰镇龙腾小区居民邓会萍的愿望。

作为镇雄县第一中学教师,邓会萍更清楚,让孩子享受优质教育意味着什么。

两年前,邓会萍面临一个选择,是让孩子留在镇雄读高中,还是去县外读高中。

很长一段时间里,镇雄县办学水平不高,当地教育一度陷入困境,曾连续19年无本地就读学生考取清华北大,不少家长对镇雄教育失去了信心。

邓会萍说,每年有大量优质生源到昆明、曲靖等办学水平更高的地方就读高中,孩子的生活费、路费等支出增加,让不少家庭因教育问题致贫。

2016年,随着云南师范大学附属镇雄中学的投入使用,邓会萍和其他镇雄家长不再在孩子就学选择上犯难。这所中学由镇雄县联合云南师范大学共同打造,引入由云南师范大学10位管理、学科骨干组成的专家团队到镇雄办学。

起初,很多家长并不相信这所学校能办好。如何让群众了解并接受学校,成了摆在校长胡克州面前的一道坎。胡克州认为,提升办学质量首先要从课堂质量抓起,而提升课堂质量的关键在于教师备课。

但是,学校教师普遍比较年轻,多为大学毕业不久,如何提升教师的能力?胡克州认为,好的办学思路需要依靠团队合作,提升备课水平要带动优秀的教师搞团队合作。

因此,他在以往办学经验的基础上,创造性



云南师范大学附属镇雄中学的学生们在上课。

本报记者江文耀摄

提出实施“三备三研”备课制度,即“多元备、自主研”“聚合备、合作研”“特色备、个性研”,实行“一周一大研、一课一小研”,每章节的教研需在课前一周完成。

4年前,35岁的数学老师郑礼从乡镇中学选调来校,如今已是备课组的带头人。

他说,在“多元备、自主研”阶段,主备人和非主备人均对该章节内容进行研究,完成“多元备”备课手稿,编写导学案。集体教研时,非主备人先讲解自己的课堂设计思路,提出授课意见和建议。

此后,主备人综合全体非主备人的意见,凝聚大家的智慧对导学案进行优化,供整个学科组使用,此即“聚合备、合作研”。最后,每名老师再根据自身特点及本班情况,将导学案特色化。

“集体智慧集中体现在这个导学案里。”郑礼手里拿着13位老师集体研讨完成的导学案。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看到,两页的“角平分线的性质”导学案上,包含学习目标、重难点、教材逻辑结构、教学指导、巩固诊断等内容。

“以前在乡镇中学没有导学案,大家各上各的课,智慧无法集中。”郑礼说,有了导学案,学生需要掌握的知识点清晰明了,还可以及时在上面做习题,有效提高学习效率。

先自主后借鉴,吸收各自特长。胡克州说:“‘三备三研’机制下,只要有一位优秀教师,就能带动更多老师进步。”

### 学生互为“小老师”以强带弱

镇雄县塘房镇芒部山村的申羽近,今年正在读高三,他父亲在江苏打工,母亲在家务农。申羽近记得,高一刚来学校时,自己偏科比较严重,数学成绩好,英语却只能考80多分,“语法、听力、口语都不好,没自信”。

受办学条件制约,对许多从乡镇中学来县城的孩子来说,这样严重偏科的情况并不罕见。来到学校后,班主任把申羽近和英语成绩好数学差的刘爽安排在一组,互为“小老师”。

在课堂讨论时,遇到不会做的习题就请教对方,都不懂的就问老师。

班主任赵桃说:“现在申羽近英语能考120多分,刘爽的数学成绩也提高了30多分。”

让学生成为彼此的“小老师”,是学校推进课堂改革,探索构建“驾驭式自主教育实践体系”带来的改变。

胡克州说,小组合作是“驾驭式自主高效课堂”的重要抓手,学校实行“两人一大组,四人一大组”的小组合作机制。

记者走进高一年级教室时看到,14张课桌有序排成三列,每桌4名学生,教室正面、侧面和后面各有一张黑板。英语老师汪凤用正面黑板授课讲解习题,其余两张黑板被划分为14个区域,上面写着各个小组的名字和

口号,用于学生课堂练习和展示。

“全校教室都是这样的布局。”汪凤说,全班学生按照“学科互补、学习互助、个性相合”等原则组建4人小组并编号,1号和2号分别是3号和4号的“小老师”,负责针对性指导;1号与2号可以就较难的问题进行探讨研究。

小组合作贯穿课堂全过程。汪凤先发放“名词性从句”导学案,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十分钟,随后讲解总结名词性从句的重点和难点,学生根据所学知识点在导学案上做习题,期间引导小组进行合作讨论。

几分钟后,汪凤从每组中抽取一名学生到黑板前作答。她发现,黄华林等多位学生混淆了“what”和“that”的用法,紧接着对这类具有普遍性、代表性的问题进行重点讲解。

“先学生、后老师,先组内、后班级,先个人、后合作。”汪凤说,每堂课都是依据导学案分阶段完成“学、教、练、展、评”各项任务。

郑礼告诉记者,每堂课老师讲课15分钟至20分钟,老师抛出问题,每个小组进行共同探究。“通过引导学生自主学习、交流探讨,让学生动起来、活起来,课堂效果明显提高。”

在申羽近看来,小组合作提升了自己的参与感、专注度、团队协作和沟通表达能力以及师生间的互动性。“让学习更有乐趣。”

## 部分“候鸟式”老人异地就医受限,一些优待政策难兑现

# 老年人权益保障,别忘了城市“老漂族”

本报记者任丽颖、哈丽娜、刘翔霄

随着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大,一部分老年人为支持儿女事业、照料孙辈,“候鸟式”离家漂至陌生城市。他们在异地他乡面临着医保、文化差异、夫妻两地分居甚至语言不通等问题。

尽管各地政府陆续出台优老政策,但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研发现,有的政策相互“打架”,有的政策距落实落地仍有差距。

### “卸”不下的十斤药袋

今年64岁的任建国自2013年起,每隔半年要跟老伴儿一起从吉林省来到石家庄照顾外孙。老人患有高血压、高血脂,加上心脏支架手术后需要药物维系,每天需要服用的药物多达5种,一天三次。

“吉林的医保卡在石家庄买药不行,因此每次去石家庄之前,我要在吉林市的多家医院拿着医保卡去开药。由于开药有时间限制,这个事情很不好办,免不了托关系找熟人。5种药开足半年的量,袋子提起来近10斤重。”任建国说。

每次把所有的药备齐后,任建国和老伴儿还有个“大工程”,就是在出发前,把堆在客厅里的各类药包装逐一拆开,每种药只留着药片统一放在小袋子里。有些药长得差不多,不留神会混淆。

“主要是为了节省空间,药盒子、包装占地,携带不方便。2013年开始,我这只‘老鸟’,就驮着快10斤的药袋子每年从吉林飞往石家



新华社发 蒋跃新作

庄,从没卸下来过。女儿总劝我们发快递,但害怕路上有遗失,我们还是选择背着。”任建国说。

原太原市老龄委一位工作人员也反映,他经常到北京接送孙子,有时一待就是几个月,因太原医保卡在北京不能使用,而他每天都要服用降压药,所以买药就成了一个问题。有时候药快用完了,只能让家人从太原买了再寄过来。

在走访过程中,多地外地老年人反映,自己需要的一些药只能在本地医院凭医生处方开药,且每次只能开一个月的药量,老人们年纪大,在异地时间长,来回奔波不方便,医保卡购药、医药费报销就成了最大的一个难题。

记者采访发现,仅在太原市,相关部门就经常接到一些异地老人的政策咨询,因异地就医、买药手续比较麻烦,老人们很关心怎样能把程序变得更简单。也有不少老人因医保手续迁不过来,续也续不上,日常就医、买药都成了麻烦,单靠某个市的力量难以突破,这需要国家统一或者各省联手研究解决。

### “走”不出的孤身茫然

两年前,内蒙古呼伦贝尔的王燕老人被女儿接到呼和浩特帮忙照顾外孙。她向记者坦言,自己总是感到非常孤单和焦虑。“女儿、女婿每天早上很早出门上班,中午不回来,晚上加班也很晚回来,外孙的一切事务都由我来管。没有帮手,没人能说说话,每天累到不行,心理压力也很大。”王燕苦恼地说。

今年89岁王贵香老人,跟随64岁的女儿从山东济南来到石家庄。因为王贵香的外孙女刚刚生了孩子,需要人帮忙带,但王贵香本人腿脚不便也需要人照顾,只得跟着女儿来到异地。

外孙女、外孙女婿给老人租了一个房子。早上,女儿给王贵香做好饭后,就赶去自己女儿家里上“上午班”;中午回来给王贵香做午饭,再回女儿家上“下午班”;晚上依旧往复。

“每天女儿走了以后,我就自己在房间里待着。因为坐轮椅,不方便下楼,我也害怕出问题给儿孙们添麻烦,就老实待在楼上看电视。时间太慢了,每秒钟都挺难熬。我想回自己的家。”王贵香说。

记者采访了多位“老漂族”发现,像王燕、王贵香一样的老人离开家乡来到异乡,面临着对当地语言、人际关系和生活习惯不同等诸多问题。即使孩子们能够让“老漂族”们享受富裕的物质生活,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,这些老人依然要忍受孤单和焦虑。

### “兑”不成的“空头支票”

近年来,针对老年人权益保障,从国家层面到各省市都出台了不少措施。相关条款从政务服务、交通出行、卫生保健、商业服务等方面,细化了不同年龄段老人可享受的优待事项。政策很好,但实际落地情况不一,有些政策甚至成了“空头支票”。

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,车站、机

场、医疗机构等场所,应当设立老年人优待服务窗口,老年人可优先购买车票、船票、飞机票,优先托运行李、物品,在各类医疗机构优先就诊、化验、检查、交费、取药、住院。然而记者在走访中发现,上述规定在个别地方同虚设。

很多受访老人反映,他们经常要在异地孩子家和故乡老家之间往返,进出火车站都是正常排队,没有所谓“绿色通道”,也不知这样的通道设在哪里。而在山西某心血管医院,记者看到,早七点排队挂号的长队中,很多老年人也站在其中。

同时,记者通过走访了解,“老漂族”群体近年成为社会热点,需要政府关注,但与此不相匹配的是,一些地方老龄组织的职能却在弱化。

“过去是协调各部门,现在只能搞老年宣传,组织点儿老年活动,处境很尴尬。其实,社会需要能体会老年人处境的政府组织去发现问题。”太原市一位长期从事老龄健康服务的工作人员坦言。

此外,多地老年人反映,几年前国家发

文要求停办老年人优待证,凭身份证享受待遇,但在有些地方想要享受优待还必须持老年证。

“每年都要接待一些异地归来的老年人办证。很多老人好不容易找到了老龄委的办公地,却办不了证,免不了有一肚子委屈和怨言。这种政策打架的情况不少,因为地方有自己的规定。”山西某市老龄健康事业服务中心一位工作人员说。